



永远的灰楼

北广新闻系59级校友心语

主 编 张清廉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永远的灰楼

北广新闻系59级校友心语

主 编 张清廉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灰楼:北广新闻系 59 级校友心语/张清廉主编.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657-1197-8

I. ①永… II. ①张… III. ①中国传媒大学—校友—回忆录

IV. ①G229.2—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6821 号

永远的灰楼:北广新闻系 59 级校友心语

主 编 张清廉

责任编辑 黄松毅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郭 琳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75 插页 0.5 印张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197-8/G·1197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编委会委员（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韩同熙 蒋咸康 刘海 孟昭琴 谢荫达 张清廉 张振华

主 编：张清廉

副主编：谢荫达

序一 半个世纪的怀念

——在新闻系59级学生毕业50年返校座谈会上的发言

◎赵玉明

学校领导、各位老师、“70后”的同学们：

今天在传媒大学的历史上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中秋甫过、国庆将临之际，来自全国各地的广播学院“黄埔一期”新闻系59级的60多位校友们在毕业50年后重返母校，师生共聚一堂，实属难得。

1959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个大庆之年。正是在国庆10周年的前夕，新闻系59级的同学们成了广播学院本科的首届“大学生”，我则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校任教的“小老师”，绵延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从此开始。四年后，你们学有所成，胸怀建设祖国的壮志，奔向了四面八方。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值此我们又在学校相逢之际，引起了我的绵绵怀念之情。

首先深切怀念广播学院和新闻系的创业者和老一辈的教师。50多年前，中央广播局的领导梅益、周新武同志等高瞻远瞩，预见到广播电视事业未来的发展急需大量的专门人才，决定将在广播技术人员训练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升格为北京广播学院。1959年9月7日，梅益、周新武同志在59级开学典礼上讲话，勉励全校师生努力办好学校，为广播电视事业培养优秀的专门人才，会后并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据周新武同志的日记记载，当年曾有梅益兼任广播学院院长之议，但后来他推辞了，于是由周新武副局长兼任院长，并任党委书记，副院长左荧（后继任党委书记）兼新闻系主任。左荧还将他当时分管的地方广播部和研究室的全部人员划归新闻系，充实教学研究力量。梅益、周新武和左荧同

志是名副其实的广播学院和新闻系的创业者。

在新闻系开办之始的老一辈教师中，令人怀念的有康荫（副系主任）、苑子熙（教研室主任）和温济泽等同志。温济泽原为中央广播局副局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遇了人生的不幸。但正如新闻系同学所说的那样，温老师不幸被贬到新闻系教书，成为我们的大幸。他的深情教诲，循循善诱的教风，给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这里要告慰同学们的是，梅益、周新武、左荧和温济泽等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有十多年甚至近三十年，但历史并没有忘记他们。最近几年，在有关部门包括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先后公开出版了《周新武纪念文集》、《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八十年来家国——梅益纪念文集》和《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我有幸分别作为编委、副主编和主编参加了上述四本纪念文集的征稿、撰稿工作。新闻系的不少师生也撰写了回忆文章。这里附告一句，明年是梅益、温济泽同志的百年诞辰，有关部门将举办纪念活动。

其次，深切怀念令人难忘的原广播学院所在地——复兴门外的灰楼。一座五层大楼办起一所大学，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当年的灰楼现已不存，原址上盖起了十多层的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馆，但灰楼当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的标语可能还留在不少师生的记忆之中。

灰楼几年的生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艰苦的办学条件、勤奋的学习风尚和敬业的工作精神，也可以说是广院创办初期的特色。正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精神哺育了广院最初一代的学子。今天，传媒大学的办学条件远胜于当年的灰楼，但艰苦创业的精神仍需要发扬光大。

第三，深切怀念与59级同学的师生之情。50多年前，我们一批大学刚毕业的“小老师”与59级学生几乎同时迈进广播学院的大门。我们年龄相差无几，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这一代青年的特点是听从召唤，甘于奉献，兢兢业业。四年后，59级同学打起背包分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前沿阵地，我们仍然留在了学校的岗位上。50年来，新闻系的老师们从来没有忘记你们。在新闻系建系30年、35年和40年之际，在历届校友支持下编印的纪念册其实就是校友的同学录。通讯录中第一部分是按年级排列的学生名

册，第二部分是按部门、按地区排列的学生名册。我每逢到广电总局有关部门和中央三台，特别是到外地出差，总是随身携带一册，走到哪里，打开一看，就能找到新闻系的校友的踪迹，随之相约会见，畅谈师生之情，合影留念。50年来，世事沧桑，不变的是师生之情，怀念的是你们为祖国建设特别是为广播电视事业做出的贡献。我们总是关注着你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新闻通讯，在广播电视中播出的视听节目。在你们当中涌现出了广电战线最早的一批正高职称和长江、韬奋奖的获得者，不少同学走上了广电总局、中央三台和地方广电局台的领导岗位，更多的是在基层单位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所有这些，都为学校争得了最初的荣誉，写进了学校的史册。

如今，我们都已是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最后祝同学们健康欢度晚年，全家幸福安康！

2013.9.24

序二 绿叶对根的诉说

——从《永远的灰楼：北广新闻系59级校友心语》说起

◎曹 璐

“我是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春风中告别了你，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如果我在风中歌唱，那歌声也为着你，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绿叶对根的情意》，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与联想，其由头来自广院新闻系59级校友半个世纪后回母校的一次团聚现场，并由此引发出《永远的灰楼：北广新闻系59级校友心语》这本书的创意、撰写、编辑与出版。59级校友约我参与撰文，推敲再三，特将文章的题目定为“绿叶对根的诉说”。

五十年后：重新感受母校的温暖

2013年9月24日上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迎来了七十多位年过七旬的“亲友团”——新闻系首届毕业班的老校友。五十年的母校——从北广至中传已彻底改变了模样。当年北广在复兴门外真武庙的五层大灰楼校址，已建成广电资料库新大楼，广播学院已改名中国传媒大学，校址横跨南北——从京通快速至朝阳路，成为拥有万人规模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如果把当年的北京广播学院比作茁壮成长的大树，59级校友正是这棵年轻的大树上崭新的片片绿叶。五十年半个世纪，几乎是人生事业的全部。这批59级新闻系校友大多是40后，上学时正值困难时期，进入中年又赶上“文革”的十年浩劫，幸好在事业顶峰时期迎来了改

革开放的年代。进入二十一世纪，他们多半已退休或退二线，进入人生的夕阳时光。五十年来他们无论在媒介还是在基层，无论在北京还是在边疆，无论在内地还是海外，他们各有各的贡献和成功，各有各的故事和感悟。五十年的风云变幻，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历练、挑战、机遇乃至磨难。应该说每个人的故事都像一本大书，每个人的成功都是母校教育质量的抽样和检验。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已不再年轻，多年来对母校和老师的思念，对同窗好友的牵挂日益强烈。在热心校友的倡议和精心组织下，在学校的多方支持下，终于实现了半个世纪后新闻系59级校友重返母校的大团圆。

母校对59级老校友返校做了细心周到的安排。校友会和新闻学院的师生们为老校友设置了校园指路标识，随处可见引导员志愿者。

真是“少小离校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同窗相见不相识，借问对方你是谁？”为了方便老校友之间彼此相认，每位校友胸前贴上了醒目的班级和姓名。新闻学院大门上悬挂着醒目的标语：欢迎59级校友回家。这其中，校友会的战琦老师等和新闻传播学部的多位老师自始至终周到安排、热心服务，使老校友们深感母校的温暖，正如一位校友所说：“五十年后重新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9月24号上午9点，新闻传播学部会议室，学校的陈文申书记、高福安副校长、高晓虹学部长、刘昶院长和当年的老教师们热情欢迎老校友们“回家”。会上，陈书记代表学校热情致词，校友代表向学校汇报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以及多年来对母校的感恩和思念。一位校友谈及：自己上学期间父母病故，家庭困难，面临失学的困境，学校给予最高助学金并帮助他安排妹妹生活，使他们兄妹顺利读完了大学。这位同学后来在广电系统担负了重任。有的校友回忆在校期间听温济泽老师讲新闻业务课受益终身的感悟。有的校友说：广院初创时期条件虽然相对艰苦，但我们收获了终身的财富——责任、信念与爱。爱社会、爱专业、爱学校、爱同学、爱亲人。这些已成为我们基因般的价值理念，受益终生。为表示对母校的感激之情，59级校友送给母校的纪念品是一位擅长书法校友朱继峰的墨宝：“育才哺英，吾师厚恩”。会议接近尾声，一位校友提议：“五十年后回母校，老学生要向母校和老师鞠躬敬礼”。当老校友们深深地鞠躬时，在场的老师们也深深向同学们鞠躬回礼。新闻学院特地为老校友们准备了一份纪念品——新闻系59级校友

毕业时全系师生的集体合影。时光穿越五十年，依稀可辨当年每位校友年轻的身影。这张毕业合影的黑白老照片，唤醒了老校友对青年时代的集体记忆，从中也凝聚了绿叶与根的绵绵深情。

五十年：感悟绿叶与根的活力

一位哲人说：“当你所从事的事业正是你所热爱的，你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从一九五九年自己来广院任教至今已五十四年。感谢命运使我毕生和学校、讲台、学生联系在一起。毕生从事我热爱的广播媒介的教学与研究。毕生学做老师、努力学做好老师。

59级是广院新闻系首届学生，他们和我同时进入广院。从1959—1963年四年广院学习，对他们来讲是知识改变命运，进入事业选择的人生成长重要时期。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助教来讲，这四年是我学习做老师，学做广播的重要人生启蒙时期。我最初担任的教学任务是给温济泽老师主持的两门新课《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担任助教，约请名家、大师来校给学生开讲座，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科研单位参观。组织和批改同学写参观杂记、采访体会等。开放的课堂开阔了学生们的视野，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较好体现了广电系统办学的人才培养优势。这四年也为我今后五十年的从教生涯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

感谢学校的培养和信任，从1977年至1997年的二十年间，我担任了新闻系从班主任到系主任到新闻学院院长等双肩挑工作。我逐渐理解了：“教师的职业就是为学生的成材努力搭建‘梯子横梁’的人”。“教育不仅是学生的知识增长，更重要的是生命成长。教育是基于生命的事业，是生命实现自我价值、社会价值或得生命质量和意义”。从中我也深深地体验到教师的另一种财富——不断分享来自学校、校友和学生的成功和喜悦。做教师的时间越长，意外的惊喜越多。

多年来，59级校友和我逐渐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因此，我有幸分享这次59级校友返校从策划到实施的全过程。59级校友回母校三天时间，除了参观、研讨之外，同学间、师生间互相诉说着多年存积的心里话，其中也涉及了对社会、对

学校、对老师、对同学、对人生的诸多感悟和思考。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这次团聚的整体表达话语是积极的、乐观的、具有建设性和哲理性的，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广院精神的“集体记忆”，也印证了当代积极心理学对幸福的最新解读：

“每一天在学习和成长中的感觉就叫做幸福”。

在告别聚餐时，校友们让我讲话，我临时动议：“能否以五十年回学校为契机，把新闻系59级校友的人生感悟以及对学校、对同学所说的、想说的话记录下来，汇集成册。珍贵的集体记忆不会因分手而离散消逝，用文字将它凝聚，留下来，传下去。”我深知当前办事之难，个人办事难，为公益办事更难。聚会后张振华、张清廉、蒋咸康等一大批热心的校友，以极大的热情、耐心和真诚，历经半年时间，稿子汇齐，全书编辑完成。这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永远的灰楼：北广新闻系59级校友心语》。

六十年从广院至中传，一代代的校友不仅是母校这棵大树的片片绿叶，他们把自己毕生的思考和感悟变成营养，源源不断注入了大树的根基，从而使母校这棵大树根深叶茂，绿叶苍翠。

引言 回忆·感恩·祝福

◎张振华

这是一本骄傲地戏称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长子”或“黄埔一期”的同学们的回忆录，是一帮70多岁的人对于青春时代的集体回访，是一篇篇心语，是一部虽显碎片化但却十分真实的关于母校、老师、同学以及工作生涯的“口述历史”。由于沉积于心底50多年，因此它像一坛尘封多年的老酒，一旦开启，一股股洋溢着母校情、师生情、同学情、事业情乃至时代情的异样芬芳扑鼻而来，耐人回味。

2013年9月23日—26日，作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首届毕业生的60多位老同学50年后重返母校，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1963—2013—50年—半个世纪—70多岁—60多位，这一连串令人感叹的数字，使师生们穿越时空隧道，置身于回忆、感恩、骄傲、拥抱、眼泪、欣喜与祝福和情感波澜中，一个个激动不已、感慨万端。而这本书就是这次活动的一个约定和一种书面式延续。

“昨是青年今是翁，人间日月急如风”，“点头才羡朱颜子，转眼翻作白头翁”。由于许多同学是毕业50年后首次相聚，因此当年虽同窗四载，但今天“你是谁？”却成了问题。好在大家见面时都首先自报家门，特别是学校还专门为每位同学准备了写有姓名的胸贴，于是，在迅速捕捉和还原了当年的音容笑貌后，禁不住拍肩、握手、相拥，一股暖流顿时把50年的时空距离归为零。正所谓“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这次返校活动也源自一种所谓的“蝴蝶效应”。毕业后飞落在辽宁的一只“蝴蝶”，他真的姓胡，名永贵，早在三年前就奋力地煽动翅膀，鼓动我组织同学返校。一则是怀念母校，二则是怀念同学。他说，大家都年事已高，相聚越来越难，事实上，不少同学已经永远不能相见了。他的心情我何尝不理解，但碍于精力、能力等原因，一直心有畏难而一拖再拖。进入2013年，猛然想到今年是我们毕业50周年，我想这是一个对动员同学返校极具感召力、号召力的时机，不容错过，甚至今后不复再有的极佳时间“窗口”，于是，下定决心在今年力促其成。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我把这一想法报告给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部长高晓虹教授（由原北广新闻系发展而来的现新闻学院的直接领导），希望她给予支持时，她当即兴奋地明确表示，这不光是你们的事，也是学校的一件好事、大事，我全力支持，并当场打电话给付海钰老师，责成他负责协调和组织。新闻学院刘昶院长知道此事后也表示全力支持，并向负责校友工作的高福安副校长报告，高校长又向陈文申书记和苏志武校长作了报告，两位学校最高领导不仅大力支持此事，而且立即责成学校负责校友工作的社会服务办公室主任战琦老师同付海钰老师一起张罗此事。而学校的这种全力支持，正是这次活动圆满成功必不可少的首要条件。在京的蒋威廉、韩同熙、朱光烈、宋家玲、刘海等同学闻讯后迅速参与和行动起来，同学校商议活动时间、议程，特别是想办法通知和动员全国各地同学届时返校。一直推动此事的胡永贵也加入联络同学的行列，找不到人就通过114查找原工作单位（如省市广电局）电话，再通过单位寻找离退休干部处，通过离退休干部处查询同学的电话。这样一路下来居然找到了不少同学。从7月到9月，我发出及回复的电话、短信几乎爆机（这些短信我至今仍保存在手机里，以做纪念），不仅要说动大家返校、通报活动日期、议程安排，而且要告知从首都机场或北京火车站到学校的公交、地铁换乘线路，甚至还要摸清在京要住多长时间、活动之外的住宿要求等，以便事先做出安排。为了同学便于准确掌握相关信息，我以为通过短信诉诸文字是最好的联络方式，但不少同学却迟迟不予回复。打电话一问才说：“对不起，我不会看短信、发短信。”甚至在通话时还高声说：“你大声，我听力不好！”对此，我们不仅非常理解，而且越发增强了我们几个在京同学组织这次活动的紧迫感、使命感。感谢60多位同学特别是京外同学终于克服身

体、家务、路途等种种困难前来参加，也感谢因种种原因想来而不能来只好请假的同学们，因为他们虽身未到，但心到了。感谢蒋成康、谢荫达、刘海、韩同熙等同志的张罗和为京外同学所做的周到服务，以及像邓法奇同学虽刚做完骨科手术，但仍拄着拐杖自始至终热情陪伴京外同学。

感谢胡占凡、王求、王庚年三位台长，慨然应允大家参观了央视新址及中央电台、国际电台新楼。占凡同志当时身在南京，同是校友的袁正明副总编代表他在央视新址接待了大家，王求、王庚年两位台长则分别带领包云、夏吉宣、王云鹏等两台领导（包为央广纪检组长、夏、王为国际电台副台长。三人均为校友）同大家见面，并介绍了中央台、国际台的发展情况及发展思路。对中央三台的参观考察和受到的热情接待，使工作在全国各地且早已退离广电一线的同学顿时拉近了同中央三台及中国广电业的时空距离、情感距离。

特别要感谢学校这次把全国各地游子召回她的怀抱，感谢各级领导和参与组织、接待的老师和同学们对这次活动的重视、支持，及所做的情感投入、人力和财力投入。当我们拿到新闻学院为我们洗印的当年的毕业合影时，当我们戴上学校为我们特制的“北京广播学院”白底红字的校徽时，当我们从学校赠予我们的微型数字播放机里听到《年轻的白杨》这首校歌时，我们这帮已经做了爷爷、奶奶的“老小孩儿”，立即又找到了做学生的感觉，享受到了在校时的甜蜜和团聚的温馨。

说实话，当年带着大学梦的我们进校报到时的第一反应是失落：一座马蹄形的灰楼居然是学校的全部：教室、宿舍、阅览室、医务室、食堂，甚至锅炉房俱在其内。我们真切地记得，听报告要到东邻的财政部招待所，新年联欢要到二炮礼堂，运动会要借用公安大学的操场，日常的体育课则要当“马路天使”。将当时的母校称之为“寒门”当不为过。

不仅如此，入学不久，北面的苏联撤走专家、南边的印度犯我边境；接着又是吃不饱饭的三年困难时期。

然而，虽然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但却是上下同心的年代；虽然生活困顿，但却精神饱满；虽然办学条件十分局促，但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已足以使我们感到庆幸。当年大家虽不敢轻言会为母校增光，但对不给母校丢脸却信心满

满；虽不曾奢望“天将降大任”，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却成了我们人生的另一种财富。

的确，当年的贫穷与困厄不仅没有使师生们萎靡、抱怨和逃遁，相反却激励、磨炼了大家的心志与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古训成了当时师生们极具现实教益的座右铭，与国家共患难，成了一代学子的壮志豪情。在校期间，大家饿着肚子刻苦攻读；毕业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同学们的自觉行动。1997年我首次去新疆，见到王乐泉书记时，仍不无骄傲地说：“1963年我大学毕业，第一志愿是新疆。我至今仍然自信，如果当时分配我来新疆，我会像其他来新疆的十来个同学一样地义无反顾。”

也许正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同国家一起经历了像“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等太多太多天灾人祸、非理性的政治狂热、残酷斗争、无情劳役；也许正因我们这一代人同国家一起经历了贫穷、落后、困顿、饥饿和外患；也许正因为种种曲折乃至扭曲折射出来的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苦与乐、沉与浮成了学校教育及学生自悟的最好的人生教材、社会教材，因此，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才多了几分理性与正派，少了些癫狂与彷徨，时时警示自己，对人要少些算计、刻薄与偏执，多些善意、理解与包容。面对事业中的矛盾和困难，要少些浮躁与推诿，多些进取、坚韧与开拓。对于职位，要多想想机遇性因素，少想点能力性因素。随时自警自问：“你以为你是谁！”

如果说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没有让学校和老师失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学校的风气与氛围的浸染，得益于老师的垂范、身教与言传。

“人无一定颜，树有百年花”。2013年我们迎来了毕业50周年，2014年学校又将迎来建校60周年。年过七旬的我们老了，但60岁的母校却风华正茂。这些年每每有人问我毕业于哪个学校时，总要替母校谦虚一番：“不好意思，小小的广播学院。”但心里却为走进这所学校感到庆幸。而今的中国传媒大学从学校规模、教师及在校学生人数、学部及院系结构、学位设置、教学领域、教学手段到社会地位，都已非我们在读时的学校所能比。当我们从媒体上看到每年招生报考的盛况时，我们深为母校的发展与魅力而自豪。正所谓“水深则鱼聚，木茂而鸟集”。

在2013年9月24日晚包云同志主持的晚餐聚会上，同学们纷纷发表返校感言，有的甚至哽咽不止。大家说，走上工作岗位后自己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得益于我们身上有“广院的基因”，北京广播学院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场的曹璐老师听了大家的发言，也十分感动，她当场建议同学们把自己的发言诉诸文字，集结成书，既留给自己做个纪念，又作为献给母校60周年一份特殊的礼物，并请张清廉、谢荫达两同志具体操作，大家非常赞同曹老师的建议，罗大芬、胡永贵等同学离京后不久即发来稿件。11月14日，我约请曹璐老师、付海钰老师以及蒋威廉、张清廉、谢荫达、韩同熙、刘海五位同学，商议共同推进出书事。次日，大家吹起了新一波集结号，动员、号召、推动同学们包括因种种原因未能返校参加活动的同学赶紧提供文章和照片。包括回到保定后即因腰椎病发作一直卧床不起的孟昭琴同学闻讯也行动起来，她说，这是同学们共同为自己、为学校出的最后一本书了，她愿作为“妇女代表”做组稿工作。可喜的是，不少同学积极响应，遂有此书。

“人生易老天难老”，“霜叶红于二月花”。50年后返校一聚，弥足珍贵！它不仅使我们重温了青春与友情，而且从互勉中获取了从容看待过往、积极面对未来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智慧。青春是美好的，没有虚度青春的老年同样美好。大家相约，要悉心呵护自己的生命之树，一方面是为了建校60年、毕业60年时再相聚，同时也是为了继续见证和分享母校今后十年、二十年的新发展。因为母校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不能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

2013年12月8日

北京广播学院1963年度应届毕业生合影留念 1963年7月29日

